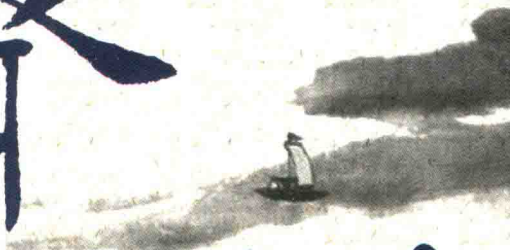


陆建德
谈晚清人物

潮聲起 海大鐸



陆建德 著

東方出版中心

潮聲鐸 海木起

陆建德
谈晚清人物



陆建德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陆建德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1

ISBN 978-7-5473-1214-8

I.①海… II.①陆… III.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①K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6569 号

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157 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14-8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自序

这本书论及以林纾和严复为主的几位清末民初人物，书名《海潮大声起木铎》是康有为诗句，借来向林纾和严复沟通中外的翻译事业表示敬意。这两位赤诚的爱国者在人生道路上做出过今人不以为然的选择：林纾不认可辛亥革命，自称“清室遗民”；严复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有人称他“帝制余孽”。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做的。米兰·昆德拉说：“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丝浓雾。他所处的现今也即他们遥远的未来，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一片光明，一览无余。回头看，人看到了道路，他看到前进中的人们，他看到他们的错误，但迷雾不再有了。然而，所有那些人，海德格尔，……戈特弗里德·贝恩、圣-琼·佩斯、季奥诺，他们都在迷雾中行走，我们不妨设问一下：谁最盲目？”^① 昆德拉想说的是我们自己最盲目。评

①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50—251页。

判晚清人物，尤其应该意识到他们身边的浓雾。

以往我们经常根据历史事件参与者公开打出的旗号来评价相关事件的性质。晚清新政期间，四川绅商获准集股建造通往湖北的铁路，但是公司管理不善，陷入困境。1911年5月，清廷得到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贷款，宣布了意在利民利国的“铁路国有”政策，不料引起一套“爱国保路”话语的猛烈爆发。这年8月9日，《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在一封私信里表达了他对清廷这次融资的乐观：“最近这次铁路大借款，亦即一千万英镑的湘鄂川铁路大借款，其条款比以往的所有贷款都较为对中国人有利，然而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担心这笔款子会不用于它所以借贷的目的。”^①莫里循通常极有见识，这次却误判了。保路运动直接导致清廷崩溃，各省宣布独立。对很多觊觎中国的日本谋略家而言，武昌的军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他们在保路运动中也有鼓煽之功。1912年3月28日，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英国职员瓦莱士从日本东京密告莫里循：

去年7月，我曾打算把当时四国向粤汉和川汉铁路贷款引起的风潮中，我所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写信告诉你，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忘了动笔，接着革命爆发，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虽然它目前已经成为陈旧的历史，然而可以从中国看出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采取的一些方法，也许还有点意思。在这次贷款的风潮期间，一些自称与警察当局有关的日本人，同中国学生中各省同学会的主席都有

①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里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37—738页。

接触，并竭力劝说中国学生尽一切所能采取向本省拍电报等办法，挑起反对计划中贷款的风潮。……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显示出日本人所采取的达到其目的的方法。^①

这些留学生在日本人的撺弄下发急电谴责贷款，坚持铁路民办，在后来标准版本的保路叙述中，他们反而是“政治觉醒”的楷模。日本被排挤在提供贷款的国家之外，自然担心自己在“天府之国”的利益受损。当时梁启超还在日本，他获知四国贷款的消息后，写了《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基本上也是唱谴责“卖路”的调子。这篇旨在打击、推翻清廷的文章势必也在留日学生中起了表率的作用，是否有人授意？但是一年前，梁启超撰长文《外债平议》分析外债利弊，在“最宜利用外债之事项”中，“用以大筑铁路”为其中之一。他当时还指出川汉公司强制性集资，看起来巧妙，实则是剥削农民之举，附股实际上是只有政府才有权力征收的“义捐”、“田赋附加税”或财产税，“私法人的集股”居然变成“公法人之征税”，自然“大悖于公正之原则”。^② 介绍这些保路运动中的细节是想使我们同情地理解林纾和严复的难处。

1917年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意在废弃古文。林纾反应激烈，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他用欧美

①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里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27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第79—81页。进入民国后，无人坚持铁路商办。曾鲲化在《中国铁路史》（1924）中详细分析了晚清铁路商办的弊端。

存留拉丁文来维护古文：“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癖也。”两年后他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重申古文不灭。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写小说的鲁迅在《新青年》给予林纾迎头一击：“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①鲁迅一度倾心于世界语，一直到30年代还主张汉字拉丁化。古文是否当废，现在已经不必讨论，然而关于新文化运动，我还想说几句。

《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是我在外文所工作时写的，我想证明《荆生》中的“伟丈夫”指的不是徐树铮，而是林纾自己，这样林纾就不会有抱“军阀”大腿的嫌疑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代表人物略有不敬，现在有点懊悔。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新文化运动是我们所继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它催生的现代文学时间跨度不过区区几十年，成就却是不朽的，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高峰之一。莫言近日表示，他愿意用自己的所有作品换一篇《阿Q正传》，可见鲁迅在他心目中的独特地位。鲁迅在作于清末的《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道出了个人解放的先声。个人解放的理念在《新青年》中进一步光大。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发表于1916年1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他呼吁国人“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为他人之附属品”。他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本书中所谈人物将如何看待这些文字？这是我给自己和读者留下来的问题。

陆建德

2017年9月16日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35页。

目 录

海潮大声起木铎 /1

——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

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 /75

——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

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 /94

不妨略剖卖文钱 /115

——“企业家”林纾与慈善事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123

——护国战争前后严复与梁启超的“对话”

附录：

陆建德谈民国初年的国家治理 /194

海潮大声起木铎

——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

一、 变法·时新小说·翻译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率众多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除了要求变法、练兵，还提出拒和、迁都的主张，以示宁为玉碎的决心。尽管“公车上书”的细节漫漶不清，当事人尤其是康有为自己的回忆很不可靠，但它确实拉开了晚清变法与新政的序幕。林纾是否参与此事，尚无确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对这类士气嚣张的群体事件深为戒惧。1897年11月，山东巨野教案引发胶州湾事件。翌年（戊戌）3月，中德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入京应试的举人又纷纷上书，林纾与净友高凤岐、清宗室寿伯弗也相约同赴都察院，欲进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受到拦阻。他在南归前驰书一位闽籍京官，告以上书的过程以及撤下的原因：“司官不揆情理，动以宪谕见胁。某等初意亦欲执礼抗辩，第念今日士气嚣动，署状动挟数百人而来，至有要遮总宪马前，峻词相稽，而总宪转下礼优容。此等举动，某等深以为不可。盖尊宪署即以尊朝廷，稍涉激厉，便非敬上之道，故敬谨将呈领回，而又不能已于言

者。”他还忠告，进言之路决不能阻塞，不然上言者“将去礼而自恣”，那将是更大的不幸。^①从这封信里，读者明显感到，林纾力主改革，心中仍存“敬上之道”，方式上也比较克制、温和。康有为呼吁变法，自为帝师、教主，激励张扬，动辄“挟数百人而来”，近乎聚众胁迫。林纾在此所指，应是康有为在戊戌年春发起的保国会（亦称强国会）集会以及随后几次声势逼人的活动。保国会设总会、分会，已具政党规模。士人干政，引起几位御史的警觉。统筹改革的中枢已经偏于虚弱，如果进退失据，无法维持社会与政体的稳定，旨在救国的变法终将误国。

戊戌年（1898）会考期间，林纾还在同乡李宣龚（字拔可）的北京寓所见到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福州同乡林旭。春夏之交，三人一同乘船南归，林旭将林纾、李宣龚送到吴淞江上道别，还交林纾《榕苍杂记》一册，请作文记述他祖父林福祚（字明府）任东流县知县时平反冤狱一事。林旭是林纾的晚辈，岳丈沈瑜庆是林纾好友，叔父与林纾同出潘澹如先生之门。1895年春，林旭拜康有为为师。戊戌年保国会成立，林旭“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②当年9月5日，光绪超擢林旭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二十三天以后，林旭喋血菜市口，不久尸体移葬故里。林纾在《林明府政略》一文记述，他听闻凶耗，“太息感伤，未有以吊也”。文

① 林纾：《出都与某侍御书》，载《畏庐文集》，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0页。都察院主管官员左都御史又称总宪。百日维新时期，礼部主事王照“咆哮公堂”就是“去礼而自恣”的一例。林纾对上书背后进退的意图十分反感：“所谓条陈，皆爱身图进之条陈，非爱国图强之条陈也。”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之一，第104页（《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

章写毕，一份文稿“令焚之晚翠墓”，以明作者不食言之意。^①此处的“令”字，读来有很多回味。林纾自传体小说《剑腥录》（1913）第十四、十五两章中的林晚翠就是林旭。在康梁版本的戊戌变法史里，光绪颁给康有为的第二道密诏（即所谓“衣带诏”）由林旭从官中带出，^②林纾应该有所听闻。

林纾的翻译与著述始于丁酉、戊戌年间。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自强变法，这是他笔墨生涯里没有明言但时时浮现的主题。林纾同情而且主张维新，但是他对康有为一味勇进的行事方式，心存疑惑，对宗派小集团（“党人”）排斥异己，更不以为然。

《马关条约》还催生了小说界的一场革命。1895年5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求著时新小说”，希望借新小说抨击时文、鸦片、缠足三大时弊。他悬赏丰厚润格，并答应择优者印行。应征参赛的稿件多达162种。^③一两年后，中国士人中的先觉者也开始意识到“说部”的奇妙社会功能，如严复和夏曾佑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④梁启超则将社会风气的鱼烂归罪于通俗小说，要

① 林纾：《畏庐文集》，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29—31页。平反的逻辑似较勉强：“余读《榕巷杂记》，叙狱事前失统，乃略易置之。”（第31页）林旭号晚翠，遗稿《晚翠轩诗集》由李宣龚编校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史学界已确定这份密诏是康有为虚构的。黄彰健还指出，康梁出逃后丑诋慈禧，对光绪极为不利，“康、梁本不忠于光绪”。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第742页。

③ 2006年，征文原稿150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发现。这些稿件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清末时新小说集》，周欣平主编）。

④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振厉末俗，改造社会，必以白话（“俚语”、“俗语”）小说开始。^①他意识到本土资源还不敷使用，因而提倡译印域外政治小说。

傅兰雅出题征文，侨居新加坡的富商、闽籍举人邱炜菱（号菽园居士）大表佩服。那年春天，邱炜菱赴京会试，谅必也为上书的热闹场面所激荡。戊戌变法期间，邱炜菱在自己主编的《天南新报》上撰文挾摘鸦片、缠足和时文三害，^②与三年前的征文遥相呼应。大约就在此时，他读了林纾仿白居易白话讽喻诗创作的《闽中新乐府》，书“掷地有声终破鬼，问天无路已惊人”十四字于后，“聊志同慨”，^③并出资翻刻，作千字长序，称这些作品“指陈利弊，匡谬正俗，明耻有功，尤与悟性之书为近”，望其为“星洲训蒙家善本”。^④庚子年（1900）春，他将发表于《天南新报》的文章撮集成篇，以《三害质言》为题刊布。他在卷首写道，当初见到征文广告，急欲阅读应征的时新小说，一年多以后，仍不见新书行世。^⑤《三害质言》书后附刻林纾《闽中新乐府》中与三大时弊对应的《生骷髅·伤鸦片之流毒也》、《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共三首）和《破蓝衫·叹腐也》五首白话乐府诗，“以大其传，并广吾论”。^⑥此前，邱炜菱已在《五百石洞天挥麈》写到林纾，称他在福建家乡为“坛坫之雄，一时称极”，两人已“翰墨神交”，并抄录

①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② 邱炜菱：《三害质言》（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刊印）篇末附记，页二十三。

③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刻本，卷九，页十六。

④ 邱炜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仲夏刻本《闽中新乐府》，页三。

⑤ 《三害质言》，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刊印，页一。

⑥ 《三害质言》中“附刻”部分的解说。

《闽中新乐府》中“尤切乡俗”者六首，希望乡人从此“言人事，舍天象”。^① 它们分别是《郁罗台·讥人子以斋醮事亡亲也》、《杀人不见血·刺庸医也》、《检历日·恶日者之害事也》、《棠梨花·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也》、《非命·刺士大夫听术家之言也》和《跳神·病匹夫匹妇之惑于神怪也》。

二十年之后（1918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克林德碑》一文，将义和拳归罪于中国文化，罪魁祸首就是比儒家思想入人更深的道教，即缘起于阴阳家、方士的种种民间信仰，比如降神扶乩、设坛授法、招魂捉鬼、算命卜卦、阴阳五行和风水凶吉等等。^② 林纾这六首诗所抨击的恰恰就是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怪力乱神。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第一部文学作品，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底由马江船政局工程处长、高凤岐表兄魏瀚出资印行，其创作很可能与傅兰雅的征文有某种联系。戊戌年（1898）初春，林纾丧偶，入夏不久，又是通过魏瀚的中介，任职于马江船政局、甫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寿昌邀他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己亥年（1899）正月，林纾移家杭州，执教东城讲舍，大约就在此时，译作在福州刻竣，^③ 从此这部小说有多种版本行世。清末译风大盛，第一部真正流行而且感动文人士子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巴黎茶花女遗事》莫属。

①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第九卷），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刻本，页十七。《闽中新乐府》中的《检历日》讽喻占候卜筮的迷信，有“须言人事舍天象”之句。光绪丁酉岁末刻本，页十六。以下所引《闽中新乐府》均用此本。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页。比较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书，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

③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第24页。

邱炜菱也把小说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他甚至打算写一部以戊戌维新的失败为题材的小说。康有为得知消息，写诗催他早早动笔，并希望小说将如观世音说法，唤醒公众，震动世界：“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诗中还有“或托乐府或稗官”之句，说明邱刻《闽中新乐府》或邱著中所引林纾乐府诗，康有为或曾寓目。^①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庚子年（1900）上半年，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为“勤王”募集资金。戊戌变法后期，康党图谋发动军事政变，案发后，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出逃，到了海外，处处挟“衣带诏”自重。邱炜菱不知康有为作伪，将他奉为上宾。那年8月，唐才常在武汉举事，得到康有为以及英日等国暗助，邱炜菱则是重要的资助人。张之洞镇压自立军后，间接对邱炜菱施加压力，使后者辞去《天南新报》总理的职位，而且公开表示与“结党营私”的康有为决裂。^②那部酝酿中的小说自然也就流产了。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邱炜菱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这些文字也成了经典：“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评语也可以这样理解：欧人性情本与华人相通，不同文化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隔阂。然而邱炜菱又略表歉意，他说林纾本欲译“政治思想之小说”以“开中

① 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0页。这首诗也反映了重新发现小说“新大陆”的兴奋：“闻君董狐说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纓市井皆快靛，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

② 关于邱炜菱与康有为的关系，详见汤志钧《丘菽园与康有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茅海建《张之洞策反邱菽园》（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国之民智”，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① 邱炜菱相信多译“政治思想之小说”可以开民智，通风气。他从英国政治小说版权高昂，看到英国民智之盛，还举出日本人翻译“皮根氏（旧任内阁）”《燕代鸣翁》的例子。《燕代鸣翁》应指本杰明·迪斯累利（1804—1881）最后一部小说《恩迪米昂》（*Endymion*, 1880）。迪斯累利是19世纪有名的英国政治家之一，长期领导保守党，两度出任首相，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封他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皮根氏”取前两个音节）。《恩迪米昂》篇幅大，带有自传性质，涉及英国1819年至1859年之间错综的政治文化。这部小说即使在华译出，也只能使读者望而却步。要打破中外畛域，还是需要茶花女这样相对简单的感人故事。再者，亚猛与马克的爱情悲剧实际上动摇了婚姻必须取决于门第、财产等观念，同样有“开民智”的功用。

晚清的小说创作，已有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但是新文学的产生，毕竟有赖于大规模引进的域外小说所形成的化学反应。文学界的木铎之声，实际上发源自域外小说的翻译。在这一领域，林纾的贡献无人可及，用“海潮大声起木铎”来形容他的文学事业，不但合适，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主角康有为/观世音被置换），余音袅袅。这句诗带出了邱炜菱与康有为交往的一段历史，将变法、时新小说和翻译等话题紧紧连接，其来历使研究者时刻不忘林纾译述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

林纾不仅是翻译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取材于时事，打破传统章回小说格式，

^① 邱炜菱：《挥麈拾遗》（第一册·第三卷），光绪壬寅年上海镌，第5页。

开风气之先。严家炎、陈平原、杨联芬等学者已经指出林纾小说有范式转换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不拟涉及。林纾为自己所译的六十余种小说作序跋（有的序跋兼而有之），共计七十余篇，长则三千余言，短则二三行，另有大量评点和识语，有的堪称完整的文章。这笔批评遗产丰富多姿，其原创性远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①之上，又因其细腻的具体性与王国维批评理论上比较抽象的建树互相映照。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往往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为起始点，好像它们是双峰突起的水分岭，于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也确定在1917年，而近代文学批评则以林纾、王国维等人为收束。^②这种分期方式留下了抽刀断水的遗憾。林纾的序跋与林译小说、林纾诗文构成一个生动有机的整体，它是中国文学转型期连接新旧的关键一环。林纾善于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本国文化，尤其是习焉不察的价值取向，往往有惊人之论；他用古文义法来理解域外小说的叙述手段，屡屡发现中西文心相近，不类而类。当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来势正猛的时候，早就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林纾反对废除古文，“强起捋须撩虎豹”，^③结果因“礼教气与反动态度”^④被打入敌对的营垒。进入20世纪80年代，林纾的地位有所恢复，林

① 鲁迅留学日本时主要通过日本明治时期介绍西洋文学的著作以及勃兰兑斯的《波兰》（英文）和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英文）编写《摩罗诗力说》。详见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陈秋帆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见马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和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 林纾：《七十自寿诗》，《林纾诗文选》，李家骥、李茂肅、薛祥生整理，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0页。

④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载《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页。